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

房列曙 胡启生

一 引言：七七事变前国防区的划分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入侵，国民政府逐步开始准备对日作战。

193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上年度国防计划大纲的基础上，制定了防卫计划大纲，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线：第一线有察晋绥、鲁、江浙、闽、粤桂区；第二线有察冀、鲁、豫、皖、赣、湘区；第三线有晋绥、宁、甘、陕、鄂、川、滇区。同年春夏，蒋介石在对川、黔、陕等省视察后说：“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①

1936年初，军委会具体规定了当年的国防军事主要任务。首先，它确立了“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②其次，确立了对日作战总方针，即“为保全国土完整，维

^① 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第3卷），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版，第211页。

^② 《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二七八七，1356号。

持民族生存起见，应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东与张家口以北地区，不得已时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强韧之抗战”。^① 再次，在持久战略思想和对日作战总方针的指导下，全国划分为四个国防区：抗战区为察、绥、冀、豫、苏、浙、闽、粤；警备区为皖、赣、湘、桂；绥靖区为甘、陕、川、宁；预备区为陕、川、鄂、湘、桂、赣、滇、新、青、藏、康。军委会为最高统帅部，在抗战区内分别设六个国防军总指挥部；在其它区域内设立一个由八省组成的预备军总指挥部，并进一步划出五道自北向南的抵抗线，以淮阴、徐州、归德、开封、新宁、郑州、洛阳一线为最后抵抗线。此外，还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将全国战场划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北正面，辖山东、冀察、河南、徐海区；二是晋绥侧面，辖山西、绥远区；三是东正面，辖江浙区；四是南海岸，辖闽粤区；五是警备区，辖陕甘宁青、湘鄂赣皖、桂、滇黔、川康区。

西安事变是时局转变的关键。蒋介石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初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在停止“剿共”的内战政策后，开始集中精力对付日本的侵略。

1937年1月，国民政府拟订了《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同年3月修订完毕。该计划不但取消了继续内战的内容，而且在上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的基础上，对中日两国的形势作了较为确切的分析和预测，明确提出了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方针，要求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② 根据预定作战需要，全国划为鲁、冀察、豫、晋绥、徐州、江浙、闽粤七个国防区及陕甘宁青、湘鄂赣皖、川康、滇黔、桂五个警备区，分别置于第一线和总预备队的位置上。同时，还部署了第一至第五方面军分别在鲁、冀察、江浙、闽粤各地的战斗任务。这

① 《一九三六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二七八七，1507号。

② 《民国廿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二七八七，1509号。

次国防区的划分,不仅体现了国民党从内战转向抗战的开始,也与七七事变后的战区划分大体接近。

二 战略防御阶段的战区划分

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政府主要进行了二次大规模的战区划分。

第一次是在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制定了抗日战略,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区划分。根据抗日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的作战指导方针,^①抗战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程潜为参谋总长,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以冀省和鲁北为作战区域,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刘峙副之,辖宋哲元、刘峙、卫立煌3个集团军;第二战区晋察绥为作战区域,阎锡山任司令长官,辖杨爱源、傅作义2个集团军;第三战区作战区域在苏南及浙江,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副之,辖张发奎、张治中、刘建绪、陈诚4个集团军,以及由谷正伦为司令的首都警卫军;第四战区作战区域在闽粤,何应钦、余汉谋为正副司令长官,辖蒋鼎文、余汉谋的2个集团军;第五战区为连接南北两战场而设,具有“中枢”地位,作战区域为苏北及山东,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韩复榘副之,辖韩复榘、顾祝同2个集团军。此时,中国陆军共170万人,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各战区。

这次战区划分,确立了战区作为正面战场基本战略单位的地位,初步形成了对日战略防御的作战体制。其特点如下:首先,它是前一个时期国防区划分的继续和发展。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有集重兵于东南沿海的打算,认为日本陆军主力便于由东北向西南侵犯,更仗其海空军的优势,随时可能于青岛、连云港、长江、杭

^① 大本营颁《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1937年3月,《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州湾、福建、厦门等处掩护其陆军的一部任意登陆,因此,将东南沿海置于“抗战区”内。这次战区划分,以七七事变前的国防区划分为蓝本,依据敌我军事态势,除了对华北地区的第一、二战区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外,更多的是突出了华东地区的第三战区。蒋的嫡系将领刘峙、汤恩伯屯兵华北,陈诚、顾祝同、张治中以及后来的薛岳均坐镇华东地区便是证明。其次,它体现了“持久消耗战略”的基本方针。所谓“持久消耗战略”,即战略上的持久战,“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①这一战略思想确立后,作为抗战时期的最高战略指导思想,无疑也是这次战区划分的战略指导思想。

中共部队和地方部队也划入各战区。1937年8月22日和10月2日,西北红军和南方各省游击队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划归第二、三战区建制。整编后的地方部队,如桂系的3个集团军、川系的5个军、滇系的2个军,在淞沪会战后不久纷纷出境,迅速编入各战区序列。此次战区划分后,因抗战的需要,战区作过小规模的调整。一是少数战区作战区域的变动。由于平津失陷,军委会针对日军进攻平汉线的战略企图,遂将第一战区辖区改划为平汉线北段。为便于华东战场的作战指挥,福建省划归第三战区。二是第六、七战区的建立与撤销。平津沦陷后,津浦路方面战事吃紧,军委会于9月初在津浦路北段设第六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后因作战区域沦陷,于10月17日取消,历时月余。上海沦陷后,我华东、华北战场形势日趋恶化。11月25日军委会又成立第七战区,位于三、五战区之间,作战区域划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川系首领刘湘为司令长官,陈诚、邓锡侯副之,辖5个军。该战区因抗战的需要而设置,蒋介石也藉此达到要川军出川,以加速四川“中央化”,建立四川大后方的战略目的。翌年1月刘湘病死,川康实力派群龙无首,乃撤销了第七战区。二是某些战区司令长官的

^①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3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96页。

调换。淞沪会战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蒋介石辞去第一、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兼职,并调走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参谋长程潜、桂系李宗仁分别接长第一、五战区司令长官。

第二次大规模的战区划分是在1938年1月。此时华北几乎全部沦陷,华东的上海、南京及长江下游几乎全部失守,中国军队主力集中于华中地区。气势汹汹的日军企图进一步南北对进,合击徐州,打通津浦路,然后沿陇海线西上,切断平汉线,占领武汉。随着战役中心向华中地区转移,1月17日,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后的军委会(蒋介石为委员长,何应钦任参谋总长)统率全国陆海空三军,重新划分了战区,并任命了司令长官:第一战区程潜,辖平汉路及陇海路中段,率宋哲元等2个集团军及战区直属部队;第二战区阎锡山,辖山西,率南路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部、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傅作义部、朱德第十八集团军及战区直属部队;第三战区顾祝同,辖江浙,率刘建绪等4个集团军及新四军等部;第四战区何应钦(兼),辖两广,率余汉谋1个集团军及战区直属部队;第五战区李宗仁,辖津浦路方面,率于学忠等6个集团军、庞炳勋1个军团、张自忠1个军及海军陆战队;第八战区蒋介石(兼),辖甘、宁、青,率马鸿逵1个集团军、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部及战区直属部队。同时设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辖李延年等5个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在西北地区,设立了以蒋鼎文为主任的西安行营,辖胡宗南等3个军团及行营直属部队。在东南沿海,设立了以陈仪为主任的福建绥靖公署,辖两个步兵师,4个独立旅及地方要塞部队。为应付战局的变化,军委会直辖汤恩伯等4个集团军计17个步兵师,作为机动部队。^①这时,全国共有210个步兵师(含在后方整训的76个步兵师和未经调整的14个步兵师)又35个步兵

^①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见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历史研究组(筹)编印《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1册,第61—69页。

旅,11个骑兵师又6个骑兵旅,18个炮兵团和28个炮兵营及其它特种部队,计投入各战区的兵力约占90%(不含整训和未调整的部队)。

为实施武汉会战,军委会于同年6月5日决定:“将利用江北之大别山,江南之幕阜山有利地形,迟滞日军,换取时间,使东南之人力、物力得有充裕时间向西南大后方转移”^①,并于三、五战区之间(湖口至宜昌以西,长江以南地区)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7月,又决定第五、九战区组成武汉会战的主力兵团,第一、三战区及海空军部队配合作战。武汉会战自8月开始,蒋介石动用了所有的机械化部队进行抵抗,但因广州陷落和平汉线门户洞开,以及长江天险被突破,10月25日武汉弃守。

三 战略相持阶段的战区划分

自武汉失守至1945年初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只作过一次大规模的战区划分变动,其间进行过若干次调整。

这次战区划分为1939年初完成。这是由于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其战线过长,兵力日益分散,便把“确保占领区”作为主要战略目标,并将进攻重点转向了敌后战场。同时,由于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蒋介石于1938年至1939年先后在长沙、南岳、西安等地召开军事会议,检讨了第一期作战的得失,制定了第二期作战的战略指导方针。方针指出:“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准备总反攻。”^②根据这一方针,军委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何应钦为参谋总

①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5卷,第204页。

②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3卷,第120页。

长,以陕、甘、青、川、湘、桂、黔、滇、康等省为抗战基地,重新划分了战区并任命了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卫立煌,辖皖、豫各一部;第二战区阎锡山,辖晋、陕各一部;第三战区顾祝同,辖苏南、皖南、闽、浙;第四战区张发奎,辖两广;第五战区李宗仁,辖皖西、鄂北、豫南;第八战区朱绍良,辖甘、宁、青及绥远;第九战区陈诚(薛岳代理),辖鄂、赣各一部;第十战区蒋鼎文,辖陕西。在敌后设立苏鲁游击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冀察游击战区,总司令鹿钟麟。此外,取消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而在桂林和天水设立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南北两大战场的所属各战区。据统计:配备各战区的兵力为197个步兵师,29个步兵旅,12个骑兵师,10个骑兵旅。军委会还以23个师为战略预备队,并轮替第一线兵团各师整训;主力配置于衡阳、桂林之间;另以9个师负责川、康、陕地区绥靖。

这次战区划分除第四战区外,均有变动。在战区最高指挥官方面,卫立煌和朱绍良分别出长第一、八战区。就新战区的设立而言,当推第十战区和鲁苏、冀察战区,前者的主要任务是“与第二战区巩固河防,并策应第一、二、三战区之作战”^①,后者的主要任务是摧毁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加强敌后游击力量。这是处在抗战转折时期,比较积极的一次战区划分。其特点如下:首先,高度重视游击战。游击战是中共部队在战略防御阶段对日作战中行之有效的战术,虽然少数国军也曾在沦陷区采用过,但最高当局迟至1938年底才不得不刮目相看。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②,并规定国军应以一部增强占领区内力量,“积极开展游击战,以期消耗敌人,极力保持现在态势”。^③在蒋介石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就有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内容。当时,军委会除设立苏鲁、冀察两个游击战区外,还规定和指导其

^①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3卷,第145页。

^② 周恩来、叶剑英:《关于蒋训话主要内容以及具体军政步骤的报告》,1938年12月1日,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102页。

^③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第58页。

它各战区开展游击战争,在这一阶段的对日作战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完成了对日作战体制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换。到1939年底,中国军队完成了两期整训,战斗力有了恢复和提高。以“战区”为基本战略单位的正面战场,大体形成了在华北以包头、大同、太原、运城、博爱、开封、淮阳、毫呆之线;在华中以合肥、黄梅、信阳、岳阳、武宁、芜湖、杭州之线为战线的敌我战略相持态势。中国军队主力开始退到西北和西南大后方,与日军进行正面战略相持;在西北各战区主要利用既设阵地,固守黄河右岸,“拒止敌人渡河”;在西南各战区以“拒止敌人”西进四川为目的,“确保三峡为作战枢轴”。^①在华中确保长沙、曲江、衡阳,“巩固华南交通枢轴”。^②至此,中国军队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对日战线。再次,由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国民政府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场,同时也含有限制、削弱中共敌后战场发展的企图。在川康陕地区以9个师的兵力负责“绥靖”,在西北地区又增设第十战区于陕西,从而与第二、八战区共同构成了对陕甘宁边区的战略包围,其目的,也是为了限制中共的发展。

至1944年着手准备战略反攻前,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调整了一次战斗序列,以及第六、七战区恢复建制和增设昆明行营、苏鲁皖豫边区总司令部、重庆卫戍司令部外,战区还有以下变化:一是第一、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调换。第一战区卫立煌调任远征军第一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于1942年继任司令长官。洛阳失守后,潼关告急,陕西划入第一战区,陈诚、胡宗南分别任正副司令长官,辖39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及其它特种部队。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步兵师由26个增至55个,步兵旅新建了3个,骑兵师由1个增至11个,骑兵旅由1个增至6个。蒋介石害怕桂系势力的发展,于1945

^① 军令部:《拱卫陪都作战计划》,《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② 军令部:《保卫粤汉路长沙、曲江、衡阳各战区协同作战计划》,《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

年2月调李宗仁任汉中行营主任,第五战区由其心腹刘峙接长。二是第六、七、十战区的重建。第六战区为防止日军进攻湘西,1939年4月恢复建制,翌年4月撤销。6月,因日军攻占宜昌,为防卫重庆外围,又以长江为中心,将第五、九战区地境各划出一部,重建第六战区,陈诚、商震、孙连仲、孙蔚如先后任司令长官,辖鄂西、鄂南、川东、湘西地区,1944年冬该战区兵力达17个步兵师1个海军舰队。第七战区于1938年春撤销,由于1940年8月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往广西柳州,广东军事指挥空缺,因此重新恢复第七战区建制,辖广东韶关至广州以北200公里,余汉谋、蒋光鼐任正副司令长官,计17个师,至1944年,减少为6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及其它部队。第十战区曾于1940年4月撤销,自黄河以西、秦岭以北划归第八战区。1945年1月,军委会为改编游击战区,在安徽立煌县重设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李品仙为司令长官,辖平汉线以东、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取代了原苏鲁游击战区的位置,兵力有16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2个骑兵师。三是游击战区的改编。苏鲁游击战区,随着第十战区的重建而撤销。冀察游击战区先后由卫立煌(兼)、蒋鼎文(兼)、高树勋接长。1944年高树勋改任冀鲁豫三省总司令兼任第39集团军总司令,并以濮阳为根据地,该战区名存实亡。

经过上述调整,第四、五、九战区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参加了国民政府发动的“冬季攻势”即粤北之战和桂南战役,1940年8月,辖区达广西全省及广东南部,兵力比一年前增加了13个师。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曾于1939年和1940年粉碎了日军的三次攻势。由陈诚、薛岳分别任正副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参加了三次长沙会战、常德战役、长衡战役。本来,第九战区所辖兵力最多,但1944年比1939年减少30个师(含划入六战区一部分兵力),牺牲惨重。顾祝同所辖的第三战区由于对敌作战较少,被抽调了约10个师的兵力支援其它战区,至1944年底,辖13个步兵师、2个突击队和其它直属部队。第八战区既是捍卫西北后方

安全,亦有监视封锁陕甘宁边区之作用,其兵力不断增长,自1939年至1944年底,步兵师由4个增至24个,步兵旅增加了1个,骑兵师由4个增至14个。

总之,这一阶段的战区划分和调整,最高统帅部减少了指挥层次,各战区基本上维持了对敌作战的防线和战略相持的局面,尤其是个别战区的调整与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对日作战的不足,对全国抗战起到了有利的作用。此外,战区的划分和调整,体现了以抗战为主的基本精神。例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战略相持阶段,各战区共进行了9次会战,498次重要战斗,21338次小战斗,各战区兵员由268万人增至317万人,兵员死亡数达1332504人,击毙日军1377056人。因此,各战区虽然表现了抗日行动的减少和反共倾向的上升,但就整体而言,抗日还是处在首位。

四 抗战后期的战区划分

1945年4月,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失利,其败局已定。日军在中国战场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战役上的胜利无法改变其战略上的失败。同时,为接受美援,配合盟军对敌展开攻势,国民政府决定重新划分战区,准备战略反攻。

这次战区划分始于1944年冬在昆明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委会参谋长何应钦兼任司令,负责统一指挥及整训西南各战区诸部队,并将兵力缩编为四个方面军及昆明防守司令部。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依次任四个方面军的总司令,云南、粤桂边界、黔、湘西分别为其作战地区。此外,陆军总司令部还有直属部队6个军。为了进一步适应对日反攻作战的需要,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4月调整了战区的划分,并公布了三大行辕、十大战区及六个绥靖区的战斗序列:军委会委员长赣州行辕主任为顾祝同(辖第三、七、九战区),汉中行辕主任为李宗仁(辖第一、五、十战区及冀察战区),昆明行辕主任为龙云(辖23师等)。十大战区的司令长官是:

第一战区胡宗南(代),辖陕甘宁及豫西,计6个集团军;第二战区阎锡山,辖晋西,计5个集团军;第三战区顾祝同,辖浙南、赣东、闽北,计3个集团军;第四战区张发奎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第五战区刘峙,计2个集团军;第六战区孙连仲,辖鄂西和湘西,计3个集团军及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吴奇伟部、湘鄂川黔边区清剿总指挥傅仲芳部;第七战区余汉谋,辖赣南粤北,计1个集团军及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香汉屏部;第八战区朱绍良,辖陕甘宁青绥,计4个集团军;第九战区薛岳,辖赣西南,计2个集团军又4个军(含新四军);第十战区李品仙,辖鄂豫皖边界,共3个集团军。六个绥靖公署分别为:川陕鄂边区、川康、广西、太原、粤东、滇黔绥靖公署,主任依次是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李宗仁(兼)、阎锡山(兼)、余汉谋(兼),此外还设中国驻印军司令长官部、重庆卫戍司令部、河南省警备司令部及军委会直属部队。

这是抗战以来指挥系统最完善、各级战略单位最完整的一次战区划分,其中三大行辕、十大战区、四个方面军、六大绥靖公署、驻外军事集团等战略单位的设置,均为适应对日反攻的需要。经过这次战区划分,国民政府军队均集中在西北和西南地区。位于西北地区的第一、二、八战区,分别辖有6个、4个、5个集团军以上的兵力,其兵力名列前三名。位于西南地区的陆军总司令部,辖有20多个军,加上当时正在编练的阿尔发部队36个步兵师(即美械师),兵力总数达到抗战时期的最高峰,武器装备也是最先进的。置重兵于西南地区,是国民政府准备总反攻的需要,是26国联军中国战区整体作战的需要,是遮断日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的陆上交通的需要。

总之,通过这次战区划分,国民政府准备反攻的作战体系已基本形成。1945年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策划了称为“白培计划”的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决定于是年秋间开始对盘踞中国大陆之

日军实行总反攻”。^① 4—6月,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开展了局部反攻,先后收复福州、柳州、南宁、桂林等城市,并计划8月初攻克广州。当蓄势待发的中国军队准备依照计划进行反攻时,日军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一阶段,国民政府设置绥靖公署并集重兵于西北地区,其包围陕甘宁边区及控制战后格局的战略意图也是明显的。

随着抗战胜利的趋势明朗化,国民政府便把夺取战略要地当作首要任务。1945年7月,第十一战区在河北地区设立,孙连仲任司令长官,以抢占华北战略要地为目的。同时,为了阻止华北中共武装力量继续向北推进,国民政府又在绥远等地新建第十二战区,傅作义任司令长官,辖绥远、察哈尔两省。

日本投降后,按照盟军受降区的划分,中国战区受降范围除日本在华占领区外,还包括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东北归苏军受降。国民政府划分了15个受降区,受降地点依次为:河内、广州、汕头、长沙、南昌、杭州、宁波、汉口、徐州、北平、济南、洛阳、太原、郾城、归绥以及台湾地区(未定地点)。此次受降区的划分竭力排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受降。国民政府在对日受降工作结束后,便一一撤销了战区。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考试研究中心)

^①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9卷,第366页。